



姜 涌 著

分配正义及其 劳动基础

Fenpei Zhengyi jiqi Laodong Jichu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分配正义及其劳动基础研究”(09CZXJ02)资助

分配正义及其劳动基础

姜涌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配正义及其劳动基础/姜涌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607-5522-9

I. ①分…

II. ①姜…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分配理论—理论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理论

IV. ①A81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6602 号

责任策划 陈海军

责任编辑 陈海军

封面设计 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4 印张 279 千字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自序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近四个世纪了,在长达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发展变化,这固然需要我们去诠释和探索。然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尤其是需要诠释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当今世界中,世界各国皆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这样的世界视域。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深入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社会生产力出现了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所有的人都被裹挟在这股涌动的潮流中。这种突破性进步的浪潮推动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全球化的全力“揉搓”中,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不断出现,国际贸易的新空间不断拓展,生产经营、资本流动、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都在发展着全球化的境遇,以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预测: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演变成了世界经济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原理,是当代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灵丹妙药”。

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并没有如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预想的那样乐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以及“金钱拜物教”只是给少数人带来了财富,却造成了绝大多数人的贫穷,社会的两极分化差距日趋加剧,贫困现象没有见好反而愈益严重,劳动者的失业率和社会的犯罪率大幅增加,等等。这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繁荣背后的种种严重危机和异化现象,更加深刻地指出了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诊断”是正确的和深刻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了”是非常幼稚的认识。在当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的《资本论》销售量大量增加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思想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即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以及经济、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方面的繁荣现象乃是表面现象,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及其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这是课题思考的前提和缘由,也是课题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

当今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主题,发展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变化。然而,发展同样也带来问题,尤其是发展与平等问题孰先孰后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套用现代人关心的话语就是:要公平发展还是要效率!放眼全球,无论是先

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发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与平等问题,人们都在企求公平的发展。然而无度的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让人们如何继续发展产生了深深的忧虑,社会的分配正义问题正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突出显现,道德的困境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本身。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桑德尔选用失控的电车来诠释人类社会面临的道德困境。^①

电车难题的困境并非仅仅是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多多少少都能找到它存在的影子。“思想的内容是什么?是经验!没有别的!我们只要失去了经验的基础,便会钻进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去。一旦政治理论家开始构筑(理论)体系,他通常就只会抽象理论了。”^②正义的分配如果不涉及现实,所谓“正义”没有任何价值,充其量只是一种正义的理论,一种对正义的文字游戏的诠释罢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分配正义理论研究,有人认为这样的课题只是一个应用研究,而我认为它是基础哲学研究,只不过我的论述贴近人的生存经验,探讨人的生活意义,以一种不同于抽象理论的方式去思考。在历史和现实中,正义的诠释不能离开或忘却的生存经验就是人类一直以来对平等的追求和向往!

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公平问题,主要是调整国家、社会(企业)、个人(居民)三者的关系。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问题。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收入分配就一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和事实充分证明,无论社会制度、国家性质如何,其财富分配的有效性对社会总财富的增长、社会稳定、社会成员的幸福感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民财富总量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长足进展。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问题也表现得更加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秩序比较混乱。

首先,我们不应该把收入分配与财富差距简单地联系起来,共同致富不同于一样致富,收入差距是一个客观事实。今天我们讨论收入分配问题,千万不要和调节贫富差距混为一谈。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严重,并据此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已处于一种危险的边缘。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误区,世界银行通过已有的发展标准来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值得商榷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有14亿人口,比当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人口之和还要多,对于这样的客观事实必须有科学的诠释,不能仅仅根据已有的标准就得出数据。我们应该承认,通过合理的收入差距,可以激发社会成员的创业热情、聪明才智和工作激情。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

^① 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朱慧玲译:《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5页。

^② Hannah Arendt, "On Hannah Arendt," in Melvyn A. Hill, ed., *Hannah Arendt: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 308.

的,但其主要原因在于非正常的分配市场。收入分配问题,其实质是公平的问题。收入分配方面发生的矛盾,主要是不公平的矛盾。如果进一步分析,“不公平”又可以区分为机会不公平、过程不公平以及结果不公平。在一般情况下,“结果”的不公平往往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让人有一种直观的感受。而实际上,机会的不公平、过程的不公平才真正让人感到不安。绝对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

其次,不能把收入分配等同于工资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存在着三个层次的分配:首先是生产分配,生产分配是分配的起点,也就是劳动分配,或者叫作“经济分配”;其次是政府分配,政府分配是中间分配,也是过程分配,或者叫作“法律分配”“程序分配”“政治分配”;再次是慈善分配,慈善分配是终点分配,也是良心分配,或者叫“道德分配”。收入分配中大量存在着对参与分配者能力剥夺的现状,是导致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原因,如:人才评价体系和人力资源市场还不健全,教育投入的价值并未充分体现,而户籍、出身、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不是简单的工资制度改革。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如何判定一个制度的优劣?我认为评价的标准不是它的许诺和各项经济指标,而是民众的幸福感如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民众的幸福生活提供一个基本的标准,让我们对自己的幸福生活有一个直观的判断呢?^① 如果民众总

① 虽然 GDP 衡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却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衡量国民富裕程度和幸福度的指标有很多,但侧重点不同。德国之声电台举例说,如果一名驾驶者引起了交通事故,那么事故双方的保险公司就要为修车支付账单。统计员将把这笔账算入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去。尽管两辆车的车主在汽车修好后生活和从前一样,但 GDP 却显示出增长。一个国家的 GDP 获得强劲增长之后,国民的生活水平是否随之得到改善了呢?德国经济学家格特·瓦格纳居住在德国吞吐量最大的法兰克福机场附近——凯尔斯特巴赫。在瓦格纳看来,经济增长越快、航班越多,飞机产生的噪音也就越大,同时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就越低。瓦格纳是德国联邦议院“增长、富足、生活质量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自 2011 年初开始,该委员会致力于制定一个新的衡量指标。社民党政治家、调查委员会主席达尼拉·科尔贝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客观反映人们对社会和生活主观满意度的新指标。”2011 年 8 月 28 日,汉堡未来学家霍斯特·奥帕索夫斯基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他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富裕指数”。这位来自汉堡的专家与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一道,对 2000 名德国公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提出的问题是:“对你来说,富足意味着什么?”结果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将安全感视为衡量生活富足的首要标准。对他们来说,有安全感就意味着生活富裕,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无生存风险比安逸或奢华的生活更重要。报道指出,金钱虽不是万能的,但却发挥着重要作用。奥帕索夫斯基在调查中发现:德国公民在定义他们的“富足”时,主要以经济情况为衡量标准。调查结果显示,有 71% 的德国人认为富足就意味着没有经济上的忧虑,65% 的德国人希望获得稳定的收入,62% 的人认为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就意味着生活富裕。奥帕索夫斯基总结说:“富足就是在有安全感和没有任何顾虑的环境中生活。”究竟奥帕索夫斯基提出的“国家富裕指数”能否成为衡量“增长、富足和生活质量”的指标,还有待观察。在其首次的调查中,按照满分 100 分计算,德国人的幸福指数为 42.4。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的专家汉斯—彼得·德鲁兹表示,在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这一指数还有很高的上升空间。然而,这一新指数不仅要做到直观、务实、易比较,还要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而距离这一步,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员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参见 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2/0903/87169_shtml)

体上感觉生活比较好的话,在笔者看来这个社会制度就是一个好制度。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发展,令中国民众在生活上实现了一个崭新的超越,这样的社会制度自然是一个好制度。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往表现为能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束手无策,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和矛盾的社会,相反,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和矛盾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可以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这样的和谐社会自然包括对民众利益要求的正面回应,以及化解冲突和矛盾的主要方式。也就是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可以这样说,社会的稳定是底线,而利益的表达是上限,二者之间的张力就是形成社会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利益博弈。

任何正义都是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正义,隐藏在正义背后的无非是利益。以此观点来看当代中国,就必然遇到这样的问题:当代中国在解决正义冲突时,应该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利益的协调与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正义的实质内容是利益,是利益关系;社会正义既表现为一种国家道德和制度伦理,也表现为一种社会秩序、一种协调和谐的社会结构。^①

^① 参见窦炎国:《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伦理学研究》2008 年第 1 期。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分配正义的基础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建构 (1)

一、劳动概念的诠释 (1)

二、关于马克思前西方劳动概念史的哲学考察 (4)

三、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缘起 (8)

四、马克思对劳动的解构——异化劳动观 (11)

五、马克思的劳动建构——积极劳动与消极劳动 (15)

六、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当代意义 (17)

第二章 马克思劳动分配正义的原点

——关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 (20)

一、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的特殊性 (20)

二、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思想的嬗变 (24)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基本形成 (28)

四、市民社会的发展与超越 (30)

五、市民社会的当下中国意蕴 (37)

第三章 阶级范畴是劳动分配正义的逻辑前提 (40)

一、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 (41)

二、阶级是马克思劳动分配正义的逻辑起点 (44)

三、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47)

四、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公正 (53)

第四章 马克思正义之解读 (55)

一、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追寻与困惑 (56)

二、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话语指认 (58)

三、《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基于现实理性批判的正义思想 (62)

四、马克思对正义概念的规范和批判 (68)

第五章 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对立

——马克思的劳动权利话语 (75)

一、劳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分析的基础 (75)

二、“权利”与“权力”是劳资关系的分析框架 (79)

三、资本即权力 (83)

四、权力资本须制约 (91)

五、“赢者通吃”与资本 (94)

六、劳动只能是权利? (96)

七、资本与劳动何为本? (103)

第六章 马克思劳动平等思想的简释 (107)

一、平等与能力 (109)

二、契约的平等原则 (111)

三、私有制与平等 (114)

四、平等与不平等 (117)

五、劳动权利的平等 (121)

六、消灭私有制才有平等分配 (124)

第七章 马克思对正义的超越

——马克思的劳动自由思想 (131)

一、自由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131)

二、马克思前的自由思想 (136)

三、马克思劳动实践自由思想的内容及其演变 (146)

四、马克思的劳动自由对正义的超越 (156)

五、马克思劳动实践自由思想的当代价值 (178)

第八章 马克思劳动分配正义的最高诉求

——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 (181)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的批判 (182)

二、劳动的定量诠释与定性诠释——劳动创造财富 (189)

三、马克思的劳动分配正义原则 (196)

四、马克思的最高价值诉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201)

五、“按劳分配”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 (205)

后 记 (211)

第一章 社会分配正义的基础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建构

在我们论证社会分配正义的前提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分配什么,我们并非分配所有的东西,有些东西是不能分配的,而能分配的东西也不能随意分配,因为有分配的规则。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主要是分配利益,而利益在今天的表现形式就是财富,因此,分配财富体现了正义问题。那么,什么是财富?财富的存在方式是什么?今天的社会,体现财富的形式主要有:作为劳动成果的财富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性存在;作为商品的财富凝结着一般人类劳动时间,是一种价值存在;作为货币的财富是商品世界的上帝、万能的尺度,并且具有与一切商品交换的能力;作为资本的财富意味着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反映着一种社会关系。

对财富的理性诠释和历史的批判性追问,是马克思劳动分配正义的基本内容,青年马克思正是因为遇到财产背后预设的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走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中诠释政治经济学,其目的所在就是诠释人的主体地位、论证人的自由状态、财富分配如何得到实现的问题,即人是生产的目的,资本是生产的工具。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资本看成是目的,而人是生产的工具,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所在,因此,劳动成为它的逻辑起点。

一、劳动概念的诠释

什么是劳动?我们仿佛都知道,但是我们能否给出劳动的科学定义呢?我认为不尽然。关于劳动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1)名词,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2)名词,专指体力劳动:劳动锻炼。(3)动词,进行体力劳动:他劳动去了。”^①如此定义是否完全涵盖了劳动的本义呢?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条件》中对劳动的含义作了解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15页。

阿伦特通过“劳动”与“工作”的区别而定义了“劳动”本义。因为在阿伦特看来,“‘劳动’(labor)与‘工作’(work)之间的区别由于太显而易见,反而被人们忽略了”^①。

阿伦特指出:“洛克说‘劳动的身体,工作的双手’,不禁让人想起古希腊语中有关‘工匠’和‘诸如用身体换取生活必需品之类的奴隶和驯兽’的差别。然而这里还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即从语言学角度看,古代与现代语言都将这两个词作为不同义的词来处理的,它们的名词形式各不相同,于是我们又一次从中寻找到了完全的一致性。‘劳动’(当用作名词理解时),从未被用来指完成的‘产品’(即‘劳动的结果’),但一直是一个可归入动名词一类的名词化的动词,而‘产品’总是一成不变地来自工作一词,即便当流行的用法紧随实际的现代发展,以致‘工作’的动词用法变得过时也是如此。”^②在欧洲,“直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起,城邦才开始以职业所需付出的精力来区分职业,以至于亚里士多德称一些‘对人的身体最有损害的’职业是最‘卑贱’的职业。显然亚里士多德不承认‘banausoi’是城邦公民,但他接受牧羊人和画家为公民,而不接受农民和雕塑家为公民”^③。“古希腊人除了瞧不起劳动,他们还有一套怀疑工匠——确切地说——怀疑技艺者的智力的理由。不过,这种怀疑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古代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评价都建立在这一信念上——满足身体所需的身体的劳动都是奴役性的。因此,只要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为了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从事的工作,尽管没有什么劳动存在于其中,也被视为一种‘劳动状态’。”^④劳动是最基本的人的存在本质,尽管统治者蔑视劳动,但是“古代人为奴隶制进行辩护,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劳动意味着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这一奴役是人类生活条件固有的。由于人类受困于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只有通过控制某些人——他们使用暴力使之屈服而劳动——才可以获得自由”^⑤。由于古代奴隶制的劳动是被动的劳动,这种劳动的被动性是双重的,既有自然生存的被动性,也有统治阶级获取不劳而获的财富而驱使奴隶进行的劳动的被动

① 希腊语中的“ponein”和“ergazesthai”,拉丁语中的“laborare”和“facere”(或与“facere”有相同词根的“fabricari”),法语中的“travailler”和“ouvrer”,以及德语中的“arbeiten”和“werken”的区别就是例子。在所有的事例中,只有与“劳动”对应的词含有明确的“辛劳、麻烦”的意思。德语单词“arbeit”原来只用来指由农奴干的农活,而不是手工匠的工作,后者成为“werk”。法语单词“travailler”源于“tripolium”,即一种苦役,它取代了旧用词“labourer”。参见 *Journal de psych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 vol. XLI, No. 1 (1948)。法语单词“ouvrer”和德语单词“werken”与现代英语中的“labor”的用法不同,“travailler”和“arbeiten”已经不再具有“辛苦、麻烦”的原意。Grimm 在 19 世纪中叶已经注意到这一情况。另外,这三种语言中,“工作”的名词形式:“work”(英语)、“ouvrer”(法语)和“werk”(德语)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指艺术作品。(参见[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6 页)

②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 79 页。

③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 80 页。

④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 80 页。

⑤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 81 页。

性。因为“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尽管后来并非如此)并不是一种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手段,也非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工具,而只是试图把劳动逐出人类生活状况的一种尝试”^①。在古代社会,奴隶社会是常态社会的存在,奴隶制社会相比古代的原始社会是一种进步,但是奴隶社会的非人性还是压制了人的创造性。

“摩登时代倒转了所有的传统,它赞扬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并将 animal laborans 提升到了与 animal rational 相提并论的地位——本来就不应该只产生一种理论。”^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生产促进了社会的财富,但是也把变成了机器人。

当然,“无论是古代人对劳动的蔑视,还是现代人对劳动的崇尚,两者都与劳动者的主观态度和活动(怀疑其艰辛的努力或赞扬其生产力)有关”。“马克思(作为最伟大的现代劳动理论家,他必然为这些探讨提供一种试金石)那里看到,劳动生产力是根据劳动者人口再生产过程的需要来加以衡量的,劳动生产力存在于人类劳动力固有的潜在剩余能力中,而非存在于劳动力产品的性质或特征中。”^③“用洛克的话来讲,‘对人类生活真正有用的’‘有益于人类维持生计的’‘好东西’,通常都是‘短命’的,如果不被消耗,也会自行腐朽灭亡。”^④“然而,当‘生’与世界联系起来,用以指出生到死亡之间这一段的话,那么它就具备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由于受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事件——生与死的限制,万物生灵的生命活动是一种严格的线性运动,其驱动力是生命的生理过程,正是每个生物的生理过程使得自然界的循环运动生生不息。”^⑤每个人的一生大体都是如此,即0岁“登台亮相”,10岁“天天向上”,20岁“为情所伤”,30岁“打打闹闹”,40岁“基本定向”,50岁“回头望望”,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当然,能够长命百岁是一种幸福,大多数人是活不到100岁的,能活到七八十岁就不错了,并且还要借助人类的保险事业、医疗事业等等才有可能活到七八十岁。“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充满经历的生活‘也许是某种 praxis’即 bios,它不同于仅仅是 zoe 的生活。言和行而讲述的活动,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观中是紧密相联的,它们确实是两种及其最终结果可成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故事来讲的活动,不管一些事件及原因有多么的偶然。”^⑥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时,他清楚地表明他是‘从生理学角度’讲这番话的。劳动和消费只是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过程中的两个阶段。这一循环需要通过消费得到维持,而提供消费手段的活动是劳动”。“‘生存必需品’决定了劳动和消费”,

①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81页。

②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82页。

③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87页。

④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89页。

⑤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90页。

⑥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91页。

“因为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是工作而非劳动具有破坏性,因为工作过程从自然中获取物质,但并未以身体的快速的自然新陈代谢的方式将物质还给自然”。^①

“劳动从社会中最低下、最为人看不起的位置一下子上升为一种人类最值得尊敬的活动,这种变化是从洛克发现劳动是一切财产的来源后开始的。当亚当·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当马克思的‘劳动体系观’——劳动成了一切生产力的源泉,是人性的一种表达——使劳动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情形更是如此。不过在三个人中,只有马克思关心劳动本身,洛克关心的只是作为社会根基的私有财产制度,而斯密则只是想解释并获得不受任何阻碍的财富无限累积的过程。”^②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创造财富。劳动者有了比较高的地位,尽管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眼里,劳动者只是一个数量的存在,但是相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劳动者的压抑,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仅仅定量的劳动分析是不科学的,因为劳动必须被定性分析才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工业革命取代了手工劳动,其结果是,现代社会的東西都成了劳动的产品,它生来就是被消费的,而不是在那里被使用的工作产品。”^③“有人常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者的社会,正如我们看到的,由于劳动与消费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因生活的必需品而强加于人的阶段,因此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这一社会不是来自劳动阶级的解放,而是来自劳动活动本身(数世纪前它开创了劳工的政治解放)的解放。”“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总是被假设为‘谋生’,这就是社会的定论,想超越谋生目的的人急剧减少,唯一社会乐于承认的例外就是艺术家,严格地说艺术家只是劳动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作者’。”^④“劳动的解放以及与之相伴的劳动阶级的解放,不再受到压迫和剥削,当然意味着人类社会朝着非暴力的方向的极大进展,但却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社会向自由方向的进步。”^⑤对劳动概念的诠释,让我们了解了劳动概念的内容和基本的组成,下面我们就劳动的概念作一个线性的历史考察。

二、关于马克思前西方劳动概念史的哲学考察

无论如何定义劳动(英文为 labor,希腊文为 $\rho\lambda\alpha$,拉丁文为 laborare),劳动在人类生活史上都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不过,在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传统中,“劳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晦暗不明的阴影之中,或被轻视,或被诅咒,或被

①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91~92页。

②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93页。

③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109页。

④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111页。

⑤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第112页。

熟视无睹。直至黑格尔,尤其是到了马克思那里,劳动问题终于有机会登上西方思想的舞台中心。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不仅关涉到他对哲学的理解和人性的定位,关涉到他对历史运转机制的发现和社会结构安排的揭示,而且对劳动问题的阐述如此独特,以至于在其身后也引发了不尽的关注和争论。

前马克思的劳动观念:从荷马到黑格尔。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传统之源泉无疑首推古希腊。而古希腊人关于劳动的一般理解和态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赫西俄德(Hesiodos)与荷马(Homer)等行吟诗人的史诗与神话。譬如前者的《劳动与时日》《神谱》,后者的《伊利亚特》《奥德赛》。首先,就荷马来说,在他的作品中,占据大量篇幅的一类内容就是诸神之间毫无节制的争吵、欺诈、偷情、冲突乃至人类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恶行,这些“恶行”对于人类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并无二致。诸神与人类的本质区别关键之处在于:一方面,诸神是永生的,而人类是有朽的;另一方面,诸神是悠闲的、安逸的,无须为“安身立命”而奔波、操劳,人类则不然,为了维持生存而被迫忙碌终生,辛劳从事各种乏味而艰苦的营生,即劳动。在这里,劳动对于人类的那种本己性、专属性、不可避免性已经十分明确,或者说,劳动的两种基本意义——必需和劳累——已经跃然而出。但是,人类的这种状况不仅仅是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受到诅咒的命运。这一点从诸神之王宙斯对人类的那个著名论调就可以管窥一豹。他曾经对着一匹神马揶揄说:“一切呼吸空气、行走在地上的物种中,没有什么比人类更悲惨、更肮脏的了。”^①所以,从荷马史诗中至少可以看到两点:其一,相对于诸神而言,劳动与人类之间具有专属的关系。其二,这种关系是消极的,因为劳动是人的必需,是人无法摆脱的强制性,是人类有朽的见证。

相对于具体身份尚难确定的荷马,作为历史上确有其人的赫西俄德所传达的劳动观念要略微复杂一些。在一篇重构或虚拟的对话中,赫西俄德战胜了荷马,赢得了辩论的桂冠。据说原因在于前者教人以和平和劳作,后者教人以冒险、战争和杀伐。确实,从《劳动与时日》的内容来看,它涉及人类劳动的神话起源、劳动的重要性、劳动的方式、技能和条件等。这似乎表明劳动在赫西俄德获得了更为积极的意义。但是,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与其说赫西俄德对抗荷马的法宝在于推崇劳动,不如说是赞颂日常生活的崇高。正如阿伦特所观察到的:“从可说是对船员两兄弟的训诫的诗歌《劳动与时日》这样的标题来看,也能知道赫西俄德更加赞颂人们留在自己家里过日常生活,而不赞赏所有的策划或冒险。他把生活的安谧、宁静上升到一种美的高度,日常生活的美,在赫西俄德那里不仅是具有每年周而复始的那种特征,而且还具有这样的特征:奴隶在主人监督下从事家务和田间的劳动,主人仅仅是监督而已。”^②根据这种解读,赫西

① [古希腊]荷马著,罗念生、王焕生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9页。

② [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俄德的《劳动与时日》实际上比荷马史诗把劳动置于更低的地位。在后者那里,劳动虽然不被祝福,但是它乃是对立于诸神的整个人类的一般事务,而在前者那里,劳动虽然受到充分重视,但是主要被归诸于奴隶的事情,逐步解除了与自由市民的直接关系。这似乎意味着劳动并非一般人类的本质性活动。

以诗歌和神话表达出来的这些劳动观念,在对“劳动”本身更加不利的情况下,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以系统的哲学论证的形式进行了“发展”:一方面,劳动是人性实现的障碍,是自由之外的事情,是卑贱的、令人生厌的。另一方面,劳动不是一般人类的本质性活动,而是专属于奴隶或最低层次的人类。对此,我们主要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为例予以说明。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或人类知识分为三个部分,即理论(theria)、实践(praxis)与创制(poiêsis)。其中,理论活动主要是探究事物的本原和原因,探究事物最一般的存在方式,追求最高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进而跟永恒的神性相契合。这是一种沉思的活动,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是对人作为理性动物的最高贵部分即理论理性的充分发挥,是幸福生活的本质所在。不过,这种活动的实现需要充分的闲暇和自由。实践活动主要是指个人行为方面的伦理活动和公共行为方面的政治活动,是追求个人伦理德性和城邦政治正义的积极活动。这种类型的活动是对作为理性动物的人之内的实践理性的发挥,涉及个体的自由选择,也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是幸福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由于实践理性在层次上低于理论理性,并且实践活动相对于理论活动需要更多的条件(不仅仅是闲暇),还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在价值上弱于理论活动。创制活动主要包括文学艺术、技艺制造、生产生活资料的体力劳动等。这种类型的活动是以产品为目的,而自身只是手段,因而不是一种自由活动。尤其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体力劳动,如耕种、畜牧等,是出于自然必然性的强制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因而是最低贱、最不自由的活动,主要由奴隶来承担。实际上,根据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即人是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几乎算不到人的范围。他说:“使用奴隶与使用家畜的确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因为两者都是用身体提供生活必需品。”^①“奴隶和动物们不能共享幸福或符合其意图的生活。”^②

两千多年西方思想传统的另外一个源泉就是犹太教—基督教系统。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经典文本《圣经·旧约》中,所体现出来的劳动观念与荷马史诗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这就是,劳动也被看作是俗世之人的一种本己活动,一种迫不得已的必需,一种艰辛和痛苦。根据《圣经·旧约》的叙述,作为人类的始祖和上帝的造物,亚当和夏娃在“原罪”发生之前的伊甸园中,完全过着一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1254b21-25。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第88页,1280a34。

种无忧无虑、悠闲自在的美好生活,没有维持自身生命之辛苦劳动的必要,也没有延续种族之生命再生产即生育活动的痛苦。遗憾的是,亚当和夏娃触犯了原罪,而上帝对这种原罪的惩罚就是赋予男人以生产劳动的艰辛,赋予女人以生育劳动的痛苦。^① 所以,作为维持自身生命和繁殖后代生命的人类劳动^②乃是来自上帝对人类这个物种的惩罚,因而也可以说是人类的专属性活动、内在性活动,同时又具有被诅咒的性质。进一步,我们也可以说,在这种语境中,人类应该为劳动感到羞耻,因为他本可以通过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而避免这种艰辛的生存方式,但是错误地使用自身的自由意志而陷入了不自由、强制性的悲惨境地。所以,劳动虽然与人类息息相关,但是仅仅是人类应得的惩罚,而非恩典。由此,劳动也就不是得救的途径。如果说劳动具有些微的积极意义,那么也主要只是抵抗肉欲诱惑的一种禁欲方式而已。例如,在早期中世纪基督教史上的隐修运动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的本尼迪克特(Benedictus, 480~542)就是在此一意义上来谈论劳动的意义。

不过,伴随着11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修道院改革,尤其是16世纪以来的马丁·路德(1483~1546)和加尔文(1509~1564)的宗教改革,劳动在基督教中逐步获得了革新性的积极意义。就路德而言,他在把《圣经》翻译为德语的时候,创造了“职业”(beruf)一词,意指上帝安排的任务。在路德看来,天主教修道士那种苦思冥想、消极遁世的生活方式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放弃现世的生活义务,是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表现。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是胞爱(brotherly love)的外在表现,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③ 就加尔文而言,按照他的预定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预知并事先就安排好了一切人的命运。但是,上帝预先只给少数人即上帝的选民以恩宠,使他们死后荣升天堂,而其余的大多数人将被罚入地狱,并且这种预定命运不可能因为功绩或罪恶而有所改变,那么人们如何确知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呢?答案就是要增加上帝的荣耀,以乞求上帝的恩宠。而唯一能够确定自己恩宠状态的方法就是经受职业的考验,经受为上帝的荣耀而进行富有成效的不懈劳动的考验。这样一来,劳动不仅是上帝的旨意,而且获得了完全积极的意义,即成为确定恩宠状态的重要手段。

宗教改革之后,伴随着基督教对人类劳动的正面肯定、启蒙运动对世俗生活的高度推崇、近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劳动水平的大力提升、一般劳动对社会财富的大量创造、市民阶层的逐步形成和壮大,劳动越来越引起哲学家和思想家

① 参见《圣经·创世记》(中英对照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3:16~19。

② 根据阿伦特的词源学考证,“劳动”一词的希伯来文、拉丁文 laborare 以及后出的法文 travailler、英文 labor、德文 arbeiten 均具有生产艰辛和分娩阵痛的双重含义(参见[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第144页)。

③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钢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8~60页。

们的关注和重视。例如,卢梭就把劳动看作“正常人的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休谟把劳动看作幸福生活的主要因素,费希特和席勒则赞颂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劳动者是将其人格注入原材料的艺术家。不过,真正把“劳动”这个概念纳入哲学体系中予以深刻思考的哲学家仍然要数黑格尔。从早期的耶拿讲稿到《精神现象学》(1807)再到《法哲学原理》(1820),黑格尔对劳动问题都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讨论。例如,在1803~1804年的耶拿讲演中,根据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劳动并不是与游手好闲或单纯游戏相区别的个别经济活动,而是人创造自己的生命/生活并同时塑造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一种精神性活动。在黑格尔看来,人类通过劳动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但是这与通过简单地吃掉对象并使其消失来满足自身欲望和需求的动物本能不同。劳动作为与人世界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借助具有持久性的工具来生产具有某种持久性的东西,即产品。^①这样一个过程,至少具有两重含义。其一,与动物对自然的直接消费即单纯否定不同,人类劳动对于自然并非在纯解构的意义上是否定性的,而是对现存世界的一种加工性的、塑造性的否定,即肯定性的否定,它建立了某种独立自主的东西。其二,人类通过劳动延缓了欲望的满足,从而也使得自己暂时能够从动物性的欲望和需要中摆脱出来,促使自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成为一种独立的、自由的存在物,一种有自我意识的自为的存在物,即从人类自身内部的自然性中解放出来。由此,劳动不仅是塑造世界的基本方式,而且也是人类创造自身生命与自由的基本途径,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精神性本质。早期耶拿讲稿中的这种独特劳动观念进一步保留于黑格尔后来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等著述之中。例如,当阐述劳动在主人和奴隶关系的辩证法中的关键作用之际,他写道:“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这正因为对象对于那劳动者来说是有独立性的。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或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在化自己,进入到持久的状态。因此那劳动者的意识便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②

三、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缘起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就是建立在劳动概念的分析、批判和论证的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也是人的自由存在的载体,

① 参见[德]卡尔·洛维特著,李秋零译:《从黑格尔到尼采》,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58~359页。

②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0页。